



萧乾忆旧

萧乾
著



AO QIAN YI JIU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萧乾忆旧

萧乾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乾忆旧/萧乾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16—04325—1

- I. 萧…
- II. 萧…
-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465 号

萧乾忆旧

萧 乾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15 毫米 1/16
字数:279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7.62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500

定价:30.00 元

书号:ISBN 7—216—04325—1/I·390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1	我这两辈子·····	[1]
2	校门内外·····	[13]
3	我的工读生涯·····	[38]
4	逃难记·····	[45]
5	“文革”杂忆·····	[54]
6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64]
7	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	[79]
8	巴金与二十世纪·····	[85]
9	杨刚与包贵思·····	[89]
10	纪念杨刚·····	[102]
11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	[106]
12	他是不应被遗忘的·····	[113]
13	我的两位老师·····	[118]
14	吾师沈从文·····	[121]
15	万世师表叶圣陶·····	[127]
16	一代才女林徽因·····	[130]
17	湖北人聂华苓·····	[139]
18	记叔华·····	[146]
19	叔华死得幸福·····	[149]
20	大姐的梦·····	[152]
21	忆冰季·····	[154]
22	想当初,胡乔木·····	[156]
23	三姐常韦·····	[159]
24	默默的奉献者·····	[180]

25	“同派之雅”话张权·····	[183]
26	老唐,我对不住你·····	[185]
27	海伦·斯诺如是说·····	[197]
28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219]
29	从斯诺的一生看新闻记者的素质·····	[228]
30	斯诺精神·····	[240]
31	萧伯纳二三事·····	[242]
32	北欧的斯诺·····	[244]
33	记爱·摩·福斯特·····	[249]
34	我在英国结交的文友·····	[253]
35	悼子野·····	[260]
36	怀念翱翔·····	[262]
37	哭亡友曹维廉·····	[266]
38	悼尊祺·····	[269]
39	悼好洋姑爷:保罗·安格尔·····	[273]
40	悼艾克敦·····	[277]

我这两辈子

您听了准会一怔。我这一辈子还没活完(也不知道我还剩多大一截儿!),哪儿又冒出个两辈子来?是不是瞎起哄,要么就是人还没活到八十六,就糊涂啦?

您别急,我的好读者。虽说我记性兴许差啦,常丢三落四,转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里抓瞎转磨;可谢天谢地,我一点儿也还不糊涂。不信,我吃着饭您硬把碗抢走,我准不答应;走道儿要是碰个坑儿岗儿的,我准老远就躲开;要是跟我话里有话,我还准听得出来。要是有机架能考验人还清不清醒,我准及格,兴许还来个满分儿。您说,要是没这么点儿本事,我还能活到今天吗?那么哪儿来的这两辈子呢?

1986年,萧乾、文洁若在美国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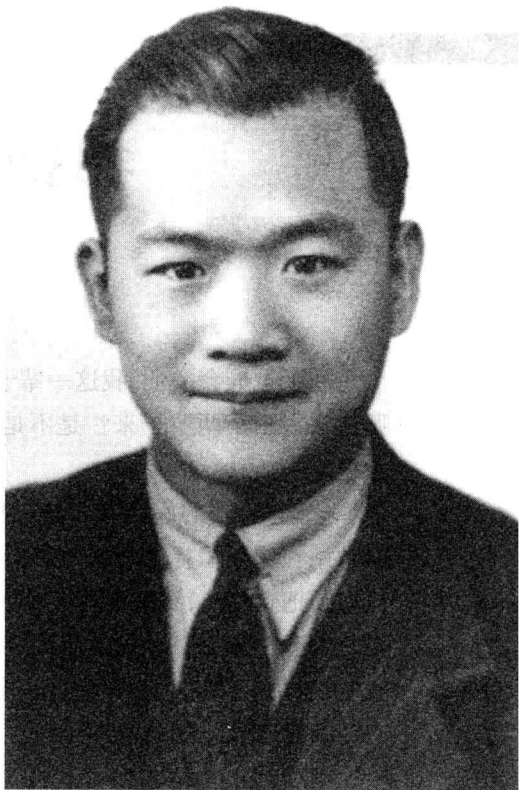
您听我说。倒退二十九个年头儿——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气的那会儿，我也忘不了的一九六六年。我连日子也没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时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国吧）可天浑地暗啦！太阳没影儿啦，世界变成了冰窖儿啦。平常老实人忽然也龇起牙来——因为要是不，别人就朝你龇。满市街抡着大刀，甩着屎棒。向来最惜命的我，最后也顶不住啦。我把偷偷攒下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得！那么一来，我就没气儿啦，随你们折腾我那尸首去吧，反正只要我还有口气儿，就不能让戴红箍儿的这么随便儿折腾下去。

后来听说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几个钟头才有人用排子车把我拉到隆福医院。那阵子人命可真不值钱。尸首就往卡车上一扔（我岳母就是这么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给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儿为界，把我这一生分为上下两辈子。上辈子活到五十六岁，下半辈子眼看就又三十啦。我老提醒自个儿：上半辈子死里逃生，命算是白捡的。虽说是白捡的可也不作兴瞎糟蹋啊。打那以后，我就老跟自个儿说：可得活得像个样儿！

这说倒容易，可做起来不易呀。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那顶帽子还戴在我脑袋上哪。您没戴过，不会懂得那滋味儿。您逛百货公司到过处理品部吗？



1939 年摄于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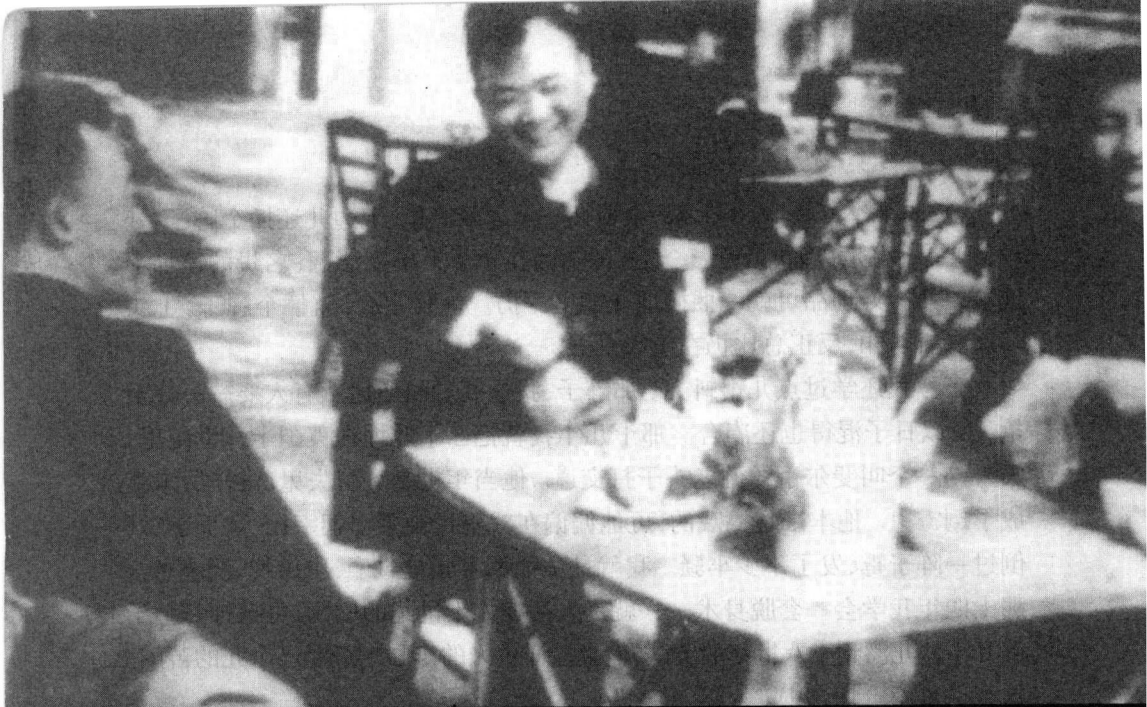
那儿，货品都不分类，也不上架，全堆在一只大箩筐里，上边儿还插个牌子：处理品，要不就是“廉价处理”。上架的货品在架子上单摆浮搁，名贵的还加个玻璃罩儿。处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里一扔。价码儿么，就插个牌子，上头写着一折八扣，反正总比扔在垃圾堆强。

多亏我还学过点儿蝌蚪文。那阵子，我这处理品还居然有人要——甚至抢，所以日子混得也还凑合。那十几年我就把己个儿埋在英国十八世纪里，天天同一个叫斐尔丁的倔老头子打交道。他当年也是个冒失鬼，难怪后来就成了倒霉鬼。他本来是搞戏的，可他偏偏在戏里挖苦了当朝宰相，这下子，好倒过一阵子霉，发了不少牢骚。我就是拿他那牢骚过过瘾，出出气，浇浇愁。那十四年我学会一套脱身术——就是人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精神和脑子都开小差儿溜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借翻译洋古人的牢骚来舒泄己个儿的苦闷。这么一来就舒坦多啦。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过得还算平静。反正头上顶着“处理品”的牌子，所以尽管那十年那么闹腾，也没人搭理我这号儿的。

十四年之后，也就是打从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头上“处理品”的牌子忽然给摘啦。其实，我还是我，可是就打筐里取出，又上了架啦。从那以后，我觉得己个儿身上别的价码儿在涨，有时候也罩上块塑料什么的。反正不但跟架子上旁的货品一样摆出来，有时候还因为我是从处理品的大筐里捞上来的，反倒还挺吃香。您说怪不！可我心里清楚，那个大筐就在我身边儿，随时都可以扔回筐里去。所以，这些年头我虽然上了架，即便多么吃香，我也老提醒己个儿：可别忘了当处理品的日子，别一上架就忘乎所以。在这一点上，当过二十几年的处理品倒也有好处。天下最难管的是人这张嘴或者手里这枝笔！我从小喜欢多嘴多舌。一九四六年说了八个字儿，泰斗多了心，就迎头给泼了阵屎盆子。所以我是早就注定得当处理品的。

不过天下事，是福还是祸，不能光看眼前。现在回想，要不是泰斗泼的那盆子屎，五十年代我不会从开头就是等外的“准处理品”。那么一来，批胡风，批孔厥，批俞平伯，批谁我也得跟着批。我准写过不少如今翻看起来会脸红的文章，而我这脸皮又没厚到事后一点儿也不害臊的地步。我总算免了这一步。可是一九五七年稍微手痒了那么一下，还是进了处理品大筐。可这么一来，九年之后我也就不可能跟着三家村四家店一块儿掉进陷阱啦。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前，萧乾出任《文艺报》副主编。图为他和《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左）、副主编陈笑丽在北京香山。后来成为右派分子的他，认为自己是被“引蛇出洞”，对此事耿耿于怀。

所以我头脑清醒的时候，还真感谢那位泰斗的屎盆子。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一九四八年和一九五七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还打心眼儿里感谢。

回想起来，我前半辈子那五十六个寒暑，酸辣苦甜咸都尝过。我生在一个穷蒙古人的家里，先头还挂龙旗。可等我懂事，就挂起五色旗啦：汉满蒙回藏。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三等公民。上学时候，给同学追着喊过不少声“达子”，而且是个穷得曾断过顿儿的达子。我老早就在民族上有过挺深的自卑感。要是查我早年的履历，我不但没敢填“蒙族”，连籍贯都不敢写“北京”。我填过大兴、通州，考辅仁时候的假文凭写的甚至是“广东潮阳”。我这民族真相还是一九五七年“竹筒倒豆子”硬倒出来的。十岁以前刚学织地毯的时候起早贪黑，一个月才挣一块钱——我居然用我这辈子头一笔工资给正咽气的苦命妈买了个水果罐头。（见《落日》）我挨地毯师傅打，上课挨老师打，回家挨堂兄打。可越打我越横了心，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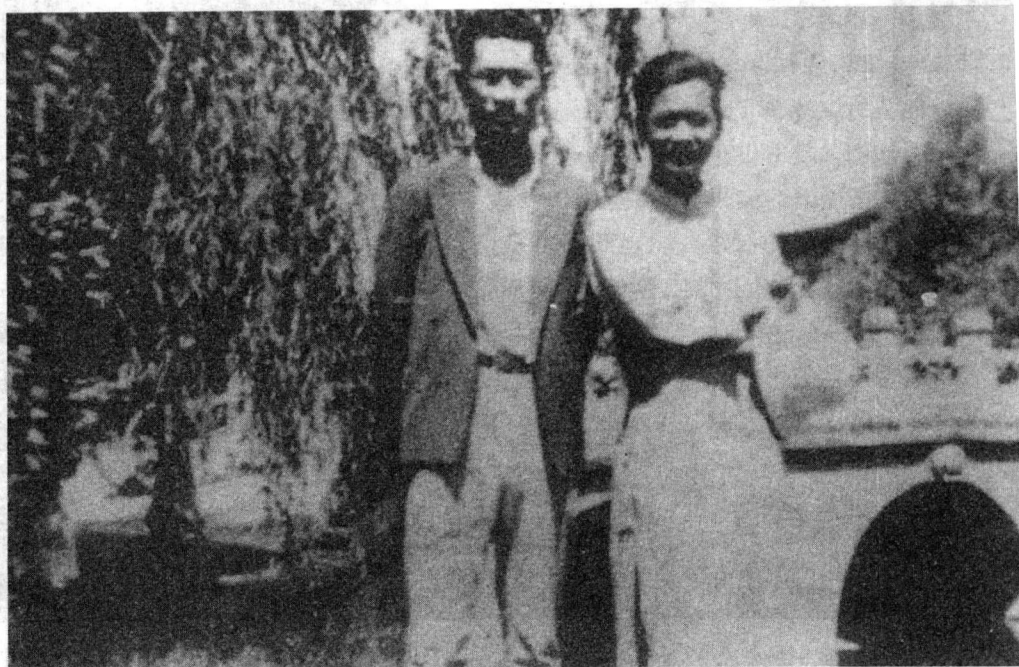
1990年，文洁若在萧乾书房里为萧乾整理衣领，被《光明日报》摄影记者柳琴抓拍了。

其实，骨子里我是自卑的，可这自卑成了我的一根鞭子。

十八岁我就远走高飞啦，一走就是广东汕头。可偏偏又碰上了一场初恋，差点儿送了命。最后，一个人打南边儿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太古船的统舱。六天六夜我睡在甲板上，一迈腿儿我就能逃开苦恼，去见龙王。可我就没迈。我那时早已看过《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是，我当不成爱情至上主义者。是那股自卑感逼着我非活下去，并且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在甲板上我可哭过好几场。

我一辈子没真正哭过几回。头一回就是妈妈入殓那天，非要我趴着棺材口儿向她说声“妈妈去西天”，说的时候还不许哭，说我要是把眼泪掉在死人脸上，她下辈子要成麻子啦。我把该说的说完，扶着棺材下来，还是裂着嘴大哭起来。从《梦之谷》（汕头）回来在海船上，我第二回哭。



1930 年与朋友赵澄(左)在燕京大学。当年正是在赵澄的帮助下,萧乾从北平前往汕头,开始“梦之谷”的漂泊之旅。

哭是哭,可我没想过去死。

我那上一辈子回想起来真像场梦。

我小时候先是在一座尼姑庵里上私塾。后来——大约十岁吧,就进了那家收工读生的洋学堂。在北新书局当过学徒,直到一九三〇年上了燕京,还给新闻系卷过《燕京新闻》。给洋教授看过娃娃。后来又帮一位丹麦老奶奶(汉学家)翻过几本《东华录》。夏天,老奶奶把颐和园的景福阁包了下来一个人住。我们就并坐在那大凉台上(底下就是昆明湖),我口译,她笔记。她就是那么写成的《乾隆传》。一九三三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与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一九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啦,他们办起

《文学季刊》和《水星》，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

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划拉出一篇小说——《蚕》。我蹬上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儿，一口气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给过过目。

那时候，我还订不起报，总是去大学贝公楼——不，是文科楼前头报板子上去看：《京报》、《益世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啦。登在紧底下，而且字数恐怕多出来啦，只好“抽条”，排得黑糊糊密匝匝，简直看不清。可我还是像当妈妈的看到玩泥巴的娃娃那样，怎么模糊我都认得出来。

我不能不提这件事，就像一条船不能忘记它起锚的码头。

打那以后，我上半辈子可以说都是一帆风顺。两年以后，我又给旁的朋友当起锚的码头。四年后，卢沟桥一声炮响，大时代到来啦。

感情生活上我迷茫过一阵，害别人受罪，自己也受罪。但是事业上我的运气仍旧挺顺当，我也没辜负那机遇。我从头到尾经历了一场大仗，不但一晚晚往回拍过多少电讯，还记下了些印象。我早就在《我与文学》里写过，“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这回纪念欧洲二战，我翻着大陆和台湾给我出的两套选集——尤其翻到《人生采访》时，我就觉得六十年后往回看，至少我这张支票还是兑现了。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六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那个大十字路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本来很简单：既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该回北平。回国之前我就从报刊上知道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多么不好过，何况我又开罪过泰斗！另外，要是真走投无路，我也就不伤那脑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请我，条件又特别优厚。我思前顾后，三宵没合眼。可是我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1962年，萧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任职时，与全体同人合影。（后排左二为萧乾，左三为汝龙）

在我上辈子的末尾——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还问过我已个儿：回来错了吗？我还是摇头，因为就是像条癞皮狗那样死在乱葬岗子上，我也还是要把骨头埋在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剑桥，亲眼看见一九四七年剑桥大学校务会议上决定聘我回去的会议记录（谢谢彭文兰小姐）。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楼，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静和现代化的舒适。回到自己的斗室（当时已经由门洞搬出来啦）之后，我又问己个儿：懊悔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都没懊悔过，现在更还懊什么悔！

我一直认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的命运并且尽力改善那命运。



1950年返母校燕京大学与新闻系同学合影，萧乾右侧是杨刚。

有一回，我曾把我这落叶归根的心思讲给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儿子听。那是在送他去机场的汽车里，他没吱声。

沉默了好半晌，他忽然提起一九六六年我在自己家院里挨斗的事。他说，“那天胡同里贴满了您的大字报，咱家给砸个稀巴烂。您胸脯上挂着牌子，把咱家的八仙桌搬到院子里，您就跪在上头，我站在您旁边儿——那时候我还不十岁。一声接一声的口号，我老也忘不了……”

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代沟”吧。

人的一生，真就是一次体验生活。当然，喜马拉雅山我爬不上去，北极圈我也到不了，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总得尝尝。我当过人所不齿的处理品，也见过挪威国王。我出生下层，混到中层，有时也尝到顶层的生活味道。我坐过张作霖的牢，当过无冕皇帝，也曾沦为大筐里的处理品。我觉得己个儿没白当个中国人。有些事在外面是怎么也体会不出来的，尤其这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这部绞肉机，不身临其境是没法儿体会的。看到人的变脸，看到人对人能狠到什么地步。



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后排右二为萧乾,前排右二为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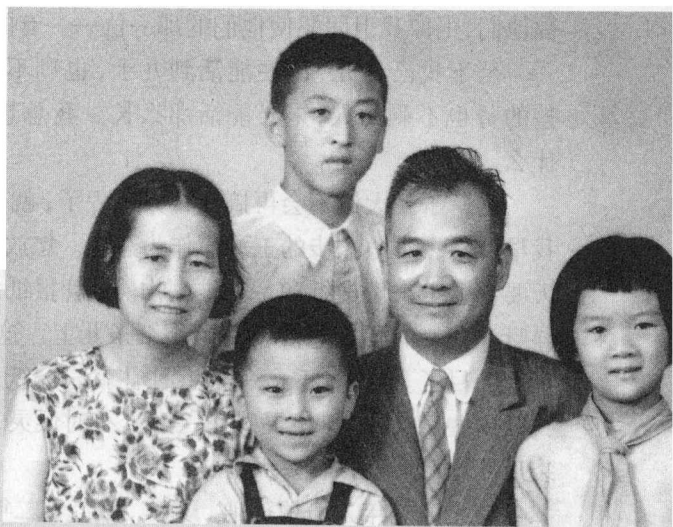
如今天晴了,心里不那么老发紧了,可还忘不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宝训。

摘下“处理品”牌子之后已经十六年了。这段日子里,我这货品又上了架。说不上名贵,可还不断受到光顾。由于当过二十二年的处理品,所以我没有也不会得意忘形。这是由于我虽然高高坐在货架上,一只眼老瞭着那只大箩筐,懂得随时还会给扔进去的道理。

我有时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类。甲类是只问是非,不顾利害的。他们是头上有光环的圣者。像伏契克和刘胡兰,像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这样的圣者。他们肯为真理、为祖国而掷头颅。对他们,我可望而不可及。另一种是只管利害不问是非的。这当然是人中的败类。这种人谁得势紧跟

谁,怎么吃香怎么来。在阶级斗争中,跳得最欢的是这种人。可遇上形势骤变,上午是猫下午就缩成老鼠的也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踩着钢丝。可是在那非友即敌的日子里,钢丝踩起来可不易。你说一百句合乎标准的话,有那么一两句出了格儿,就单抓你那两句,而且往死里打。我就是那么成为处理品的。

其实,我这下半辈子应该从一九七九年二月算起。那以前,世界上就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在柏各庄修座桥,说“来几个右派”,扛铁铤过来的我就是。幸而我还有编制,所以三年后又坐在书桌上了。可二十二年我就像个得了麻风病的,没几个熟人敢沾边儿的。我总觉得身上缝着什么黄布条儿或旁的“次等人”标记。那时候,我老背诵那句印度格言:我没鞋,我痛苦;可我还看到没有了脚的人——那就是一划右就妻离子散的。



1963年老大升入26中高中,全家人到王府井照了一张纪念照。萧乾穿的西服还是1946年从英国带回来的。



真的，跟许多一块儿倒霉的比，我还算是幸运儿。没罚我在胡同口下过跪，连一脚也没挨过。回想起来，我碰到的戴红箍的真是仁慈、文雅多啦。

我常想，那些热血青年今天在干什么：进工厂？出国留学？在搞创造发明？我相信今天都用当年喊口号的胳膊，打人的手，在做着有益的事。我祝福他们，正像我诅咒驱使他们的那一伙——有的早已变成了粪土。

至于我已个儿，即便能活到九十，也剩不到五年啦——我这连一个完整的肾也不剩的人，未必能活那么长。我总想趁着还有口气儿，再写点儿什么。

这辈子我大概不会再搞什么大工程了，就只想写点儿七零八碎，并且用我早晨常去水边散步的玉渊潭作为总题。您放心，我不会老谈己个儿。我每天要看上来十来份报纸和一大堆刊物。尽管报纸大同小异，可毕竟还有点儿小异呀。我一有什么想法就写到小纸条儿上。这是我的老毛病。眼下又有几十个题目了。当然，日子一长，我往往就忘记纸条背后想过的话了。没关系。我管这些字条儿就叫“灵感”。当然，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反正活一天脑袋瓜儿这机器就得转一天。

有人说老年人最怕孤独。其实，那二十二年才真孤独哩。现在我并不孤独。一点儿也不。我常跟老朋友用电话聊天儿，身边又交了几位年轻朋友。最重要的是我手里还有这管笔，坐下来就能同成百上千位读者朋友聊天。有时候拉家常，有时候掏掏心窝子。话不一定全中听，可我顶希罕的就是这种畅快的心情。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

(选自《玉渊潭漫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